

书包的形制与教育规训

陈广春 熊和平

摘要 半个世纪以来,中小学生的书包形制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符号、学生身份符号与教育消费符号三个阶段。书包的外观、材质与结构,暗含着特定时代的教育规训方式及其运作机制,甚至表征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包是学生命运的镜像。

关键词 书包; 形制; 教育规训

作者简介 陈广春/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宁波 315211)

熊和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员 (宁波 315211)

书包的形制是指书包的大小、图案、材质等外观以及内部结构等形状与制式的总称。从近五十年来看,书包作为学生存储学习用品的工具,早已被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系统,不仅呈现了一些主流意识形态所宣示的历史解释和现实意义,而且还通过形制的设计来再生产这种认同机制。显然,书包的形制不仅是教育权力和学科知识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教育权力与市场机制相联姻的结果。我们试图通过对书包形制及其隐含的教育规训机制的分析与解构,揭示学生与书包其实有着类似的命运。

一、书包形制的变迁

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至今,我国中小学生的书包形制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它们分别是六七十年代书包作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八九十年代作为学生的身份符号以及二十一世纪以来作为一种教育消费的符号。

(一)意识形态的符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身穿一身劳动布衣,斜挎一只军绿色军挎包,是这个时期中国人最常见的装扮。几乎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都在使用军挎包,这些以自制方式为主的挎包大多是单肩斜背的,一般是由平常百姓家做衣服剩下的布料制作而成,无论从颜色、面料还是款式来说,都比较单一,自制挎包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军绿色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色彩,而且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政治态度,集体意识的高度统一似乎成了这个时代唯一的表达方式。此外,军挎包的包盖上绣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或者毛主席头像,这

些标志性文字和图案充斥着浓厚的国家主流宣传意识。一方面,它表现为一种革命话语,即用类似革命时代的“奉献精神”来规训学生并使其融入社会的主流秩序。另一方面,它作为书包盖上的一种醒目符号,由于其公示的作用,所以被用来对学生施以一种隐性的教育规训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感染。

这个时期的书包没有或很少有市场价值上的差异,从形制上看不出贵贱之分,只有新旧之别。轻便的斜挎包是学生学习生活轻松愉快的体现,同样也是一个嵌入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书包承载的不只是那一代人的求知欲,还有童年的欢乐和梦想。

(二) 学生身份的符号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不断深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孕育着丰富变化的商品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书包千变万化的时代。各种新鲜事物纷至沓来,大众化的“集体消费”审美被更多个性化的形象取代,军挎包开始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展现个性意识逐步成为学生生活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的书包不仅在色彩和材质上突破了以往军挎包的单调色彩和单一材质,呈现出鲜艳的色彩及丰富的图案,而且书包的形状和内部格局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轻便的军挎包样式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方正的书包外形设计,它们剪裁简练,方正规矩的特质尽显在书包外形上并开始主导书包市场。书包内部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层设计,告别了以往把各种东西都混放在一起的时代。显然,方正的外形和细致的分层成为书包设计的主要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书包设计者试图迎合学校所安排的制度性设计,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力量隐藏在书包的形状和内部结构中。最为典型的是双肩包,它的出现是商业开发与教育规训相互作用的产物。

书包作为学生上学的随身物,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代名词或身份确认符号,并逐渐从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中分离出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学生背书包,犹如战士扛钢枪,农民拿锄头,工人抡铁锤,文人握笔杆,这叫配套,是天经地义的。”^[1]此话成为了八九十年代人们的教育共识。

(三) 教育消费的符号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为特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的“爆炸时代”与“消费时代”悄然来临。拥有一个漂亮且合心意的书包成为上学梦想的岁月早已远去,迎来的是书包泛滥的时代。仅仅书包的种类就让人眼花缭乱,有斜跨式、双肩式、拉杆式等,而曾经被边缘化的军挎包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这些军挎包被重新设计和改良,它们一方面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能表达人们“复归”与“怀旧”的美好愿望。此外,为了顺应“知识爆炸”的潮流,书包不仅在体型上逐渐增大,而且人们也将新的技术手段应用到书包制作的过程中,其中关注学生身体发育的书包逐渐走入市场,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类似行李箱的拉杆式书包。拉杆包起初只是旅行者的专利,如今这种形状也被纳入书包设计的体系,成为了书包的新元素,多功能成了这个时代书包的标志。